



# 续西行漫记

(美)尼姆·韦尔斯著



# 续西行漫记

上册

〔美〕尼姆·韦尔斯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印

## 《续西行漫记》翻印说明

《续西行漫记》是美国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所写。尼姆·韦尔斯曾继斯诺之后，也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九月采访了我国西北的革命根据地（即后来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本书就是作者根据这次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写成的。由于本书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许多历史情况，因此我们将其翻印出来，供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教学、研究人员参考。

本书是根据复社一九三九年四月印行的中文版本翻印的。翻印时，我们对原书的内容未作任何更动。但由于印刷条件所限，原书附有的六十四幅插图却不得不舍去了。

因本书是供内部参考之用的，故请读者不要公开引用。如需引用，则请务必核对原版本。

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习研究会

一九八〇年三月

# 目 录

## (上册)

### 第一章 到苏区去

- 一、再度的“非法旅行”…………… (1)
- 二、逃到苏区…………… (12)
- 三、跟彭德怀在前线…………… (21)
- 四、神出鬼没的青年队伍…………… (29)
- 五、死的礼赞…………… (39)
- 六、向延安进发…………… (55)

### 第二章 苏区之夏

- 一、在红堡中…………… (67)
- 二、我个人的房间…………… (76)
- 三、流动剧团…………… (90)
- 四、武装的艺术家…………… (102)
- 五、青年的自助精神…………… (107)
- 六、朱德的一生…………… (119)
- 七、“神行太保”——罗炳辉…………… (130)
- 八、黄埔老战士——徐向前…………… (141)
- 九、无产阶级出身的领袖们…………… (148)
- 十、红军医务人员和基督教…………… (161)
- 十一、中国字变了…………… (166)
- 十二、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和成仿吾…………… (173)
- 十三、蒙回藏三族的先觉者…………… (182)

## (下册)

### 第三章 妇女与革命

- 一、中国的女革命家
- 二、共产主义妇女的导师——蔡畅
- 三、无产阶级的领袖——刘群先
- 四、红色女战士——康克清
- 五、丁玲——她的武器是艺术
- 六、红色民国之妇女

### 第四章 中国苏维埃的过程

- 一、中国苏维埃的改制
- 二、中国革命的分析
- 三、未来的窥测
- 四、关于托派的二三事

### 第五章 中日战争

- 一、第八路军的行进
- 二、九月的早晨
- 三、“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 附 录 八十六人略历

- 一、政治领袖
- 二、军事领袖
- 三、开除党籍者

## 一 再度的‘非法旅行’

他看上去累了。他的眼睛下面有着睡眠不足的黑圈。但两只眼睛却闪着发现的光芒，而在他粗硬的小胡髭下面，又隐匿着一种中国人的胜利的微笑。

“早安，太太，”他庄严地鞠着躬，交给我一张公安局的卡片，指挥刀在他的身畔铿锵地作声。“你又回到西安来了吗？”

“是的，我又来了，王队长，”我轻快地回答着，我也希望能装出一付中国人的淡漠的样子。“我正等着你。”

他四周顾望那安放着我的铺盖、吊床和两只旅行提篮的小房间。那微笑几乎不自禁的迸发出来。

我是前一天早晨到达西安的，顺利地通过了火车站的宪兵，将我护照内容以及我以后在西安迎宾馆的住址留下给他们——迎宾馆是西安的外国人可以住居的唯一旅馆。但我并不在迎宾馆开房间，却另外顿在一个朋友的朋友的中国式住宅里，希望保持几小时的秘密。我又安排着在王队长可以找到我之前，就于当天早晨五时离开西安。但是一阵初夏的倾盆大雨，阻止了军用卡车的开行。当王队长来访问我的时候，我正期待着第二天早晨五时动身呢。

我知道我到西安的消息，曾由宪兵去通知警察当局。但我直到后来才明白王队长和公安局长以及西安大部分的侦探，曾经一夜未睡搜寻我。他们搜查了每一个教士的住所。当搜查时

候，想必不知有多少同样无辜的中国家庭被吵醒过来。同时，所有出城的各种车辆都须检查，守兵并且奉到命令注意我。

“我可否看一看您的护照？”王队长操着很不错的英语，和气地问。

“我是有护照签证的。”我把签证纸摊开来，上面很明白的曾由中央政府外交部的北平办事处签字盖章。

他并不信服。“但这还是去年发出的。一九三七年西安不曾颁发外国人的护照签证。没有正式的护照签证，您在这里只能逗留二十四小时。”

“但这要到九月才失效。”我指着里面的条文说。“九一八！正是日本人进攻东三省的日子。西安已不复是叛变的城市，是不是？你意思是否说你不承认中央政府的签证呢？”

我抓住了一点。但他却以一付占有的神气拿起了我的护照。

“这不是成了吗？”我问着，温和地从他的手中把我宝贵的文件拿过来。

我实在担心。在中国内地，警察当局无限期的‘检查’你的护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时候，外国人就不能跑到城墙外面去。我知道几天以前，这位王队长曾想吊销我的一位报界朋友的护照，后来这位朋友竭力抵抗，引起了一场吵闹。他总算没有坚持下去。

我是四月二十三日到达的，距西安事变主角东北军的退出围城，不过六星期。当时任何人要跑进西安去，实在是一件难事。新的护照签证一张没颁发。两个德国商人跟有几个教士一道被遣送回去了。事实上，只有旧居西安的外侨，才准许回到原地来经营他们绝对合法的商业。然而事情却还有另一面。

“照你的特殊情形，”他说：“倒不仅是一个护照签证的问题。中央政府曾下了一个特别的军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跑进西安

周围的军事区域，因此，你要离开这里是不许可的。举例说，你不能跑到绥远去，因为那里的匪徒情形很不好。我们曾从南京接到一张外国记者的名单，你丈夫的名字正是放在第一个。你还是马上回到北平去的好。”

“但我的名字并不在内，是不是？”我问，“你尽不必注意我。”

“那倒不要紧。你跟你的丈夫原是一样，而你又在干新闻工作。”

我不知道怎样对付才好。他们已把我当作一个惹是弄非的新闻记者记在簿子里，因为我曾在去年十一月发表一篇张学良少帅的访问记，这几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早熟。

正当这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在门口争执。我的一个中国学生朋友进来了，他是来看我的，而被那守候在屋子里的四个便衣警察抓起来。我听他在情急中说着伪造的名字和地址，这实在并不必要，因为如果被察觉，反而有逮捕的危险。中国的警察恐怖是很大的，仅仅为了质问上的便利，人们常被传去，一押就是几星期，因此，弄得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不自觉的想尽法子，以逃出眼前的掌握。

王队长套上他的白手套，准备离开。他把便衣人员叫过来。“当你留在西安期间，我给你派定这班个人的卫队来保护你。局面非常纷乱，外国人在这里是很不安全的。”

“啊！”我望了一望四个强健的便衣人员说。“假使玛太哈里（欧战时著名的女间谍，——译者。）跑到镇上来，你们将怎么办呢？”

“从来没有日本人到西安来，”王队长回答说。

我的预定计划打破了。我没有别的事情，只是谢谢我的女主人，并且把我自己搬到外国旅馆去，以免她再受麻烦。到了那里我可以重行酌量情形。我只带了一只旅行手筐到西安迎宾



馆去，假装那门外的行李是并非属于我的。两旁是卫队和我的学生朋友，我们成了雨中一队小小人力车结成的人马。

一到旅馆那学生就离开了我，从此我不再在西安看到他。他甚至不敢回来看我，因为警察似乎已发觉他谎造假名，而怀疑他。约莫一天之后，我接到了一张邮片，简单的写着：“天仍是下着雨。”后来我才知道警察确曾发觉他的谎语，而他也曾去躲避了一会。

我在迎宾馆二楼开了一间有阳台的房间，而我的所谓卫队也住了下来。——其中一位颇有罗米奥（Romeo）气概的住在阳台里。这时候，他们的队伍扩充到七个。在长椅每边的门口站了一个，还有两个流动队员，专事当我行走时候保卫我，冲到电话旁边去倾听，以及盘问一切访问者。其余都是替班。晚上，他们整夜不睡的留守在自己的岗位。

周君是迎宾馆一位殷勤的外国典型的经理，他的态度诚恳而傲然。他是一个忠实的基督教徒，青年会的一个领袖，对于所有游历西安的外国人都非常之熟悉。然而，显然的，他的作为一个完全外国式的基督教主人的恭顺，却并不推及到我所立意一去的这种匪区。第一天他就来拜访我，并且温和地说：

“你如果打算去延安，你还是现在作罢，回到北平去。你是没有机会的。我曾受到警察的警告，如果你想脱逃，我得负责任；旅馆里的每个茶房都被警告过。所以你是完全包围起来了。他们甚至命令所有的汽车行，拒绝你租车到任何地方去，你只能坐旅馆的车子。李夫和凯恩到红区的旅行，已堵塞了你所有的机会。我可以告诉你，没几天以前，刚派来了一个新的公安局长，他是决不让任何人通过到赤区里去的。”

我不承认要到延安去。我不要任何这样的承认记录下来。

“当然，我不能去延安，”我同意说，“不过我偶而自然也要跑出去，看看周陵或几处名胜地方。”

“你没有两个侦探跟从是不能走出房间的，即使你是回北平。”

我的军用卡车已在五点钟开往延安了，我知道。太阳在无雨的天空是格外的光亮和美丽，这使我的环境只有愈加阴郁。

‘禁城’离我并没有比西藏近。我坐下来沉思着望尽天涯的喜马拉雅山。

我当即聚集了充足的报道来估量我的境遇。我的境遇正是中国人所说的‘特殊情形，’因此，不能采取一种消极的方法，而由地方上法律和警察的力量联合动员来阻止我的旅行。这不是我第一次的犯禁，也是斯诺一家的第三次了。

有两次重大未了的案子，地方当局是正以我为不幸的对象要求全部补偿的：

首先，事实上斯诺这个名字本身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咒诅。‘去年的斯诺他们那里去了？’现在又重行成为西安警察口头的曲子。前年六月，我的丈夫斯诺曾偷偷地从西安溜到苏区，在那里住了四个月，然后又回到西安，那恰是这年十月蒋委员长到西安视察军事的一天。同时十月初旬，我也在红军一个秘密使者的保护之下到了西安，也怀着到苏区探险的同样纯洁的愿望。我这第一次的尝试终于不光荣地失败了。那时候，第二和第四路红军刚从南方开到，一次新的剿共运动已着手准备，而那以十二月十二日劫持蒋委员长为顶点的大政变的幕景也正在布置着，因此我不得不返回北平，只好等将来再作尝试了。

当这紧张的时候，虽然蓝衣社的特务队员都集中在西安，并且尽着最大的作用，但这些冲破封锁线到苏区去的尝试，他们却全然不知道。他们以为我们只不过是合法的旅行记者。事实上他们对于情势一些不明了，直到月底一个教士传出了斯诺死于甘肃匪徒手中的消息，以及美国故乡报纸发表了他的噩耗。于是

不仅那办事不力的特务机关来一次总改组，甚至省主席邵力子也被召去报告，因为在这时报上又传斯诺夫人在新疆被另外的一队匪徒所杀。虽然西安公安局的报告说我于十月初旬在当地游历之后，已平安地回到了北平。到处是斯诺，可是西北的地方军事当局却统统不知道。当我们发觉了情形，从北平发电通知西安司令部的时候，他们正在发动调查我俩夫妇呢。南京政府也牵入了这事情。为信赖他们特务机关的无知，他们声明否认斯诺曾经深入到苏区。是的，直到面对了报纸上千真万确的照片之前，他们决不相信九年来苏区的新闻封锁会给冲破的。官方‘面子’的损失实在难以胜计。而这里又来了罪恶的斯诺家庭中的一个！

其次，更近的，我还得代两个别的旅行记者来补偿。一当西北事变解决，西安之围解除，就有上海六七个外国记者决定到红区游历一次，而苏区当局也曾邀请中国记者到那面去参观。其中一个非常谨慎地想从南京政府领取到西安的护照，南京政府立即禁止他们去。纽约论坛报记者凯恩，一脚刚踏上飞机就遭了扣留。然而他最后终于到达了苏区首都的延安。当他回来经过西安时，他几乎跟我的朋友王队长拳斗起来。美联社的李夫，是第二个偷去的人，他在早晨四点钟逃过他的西安‘卫队’在延安住了几天，然后在警察发觉怎么一回事之前，又从西安回来。约莫同时，有一年青的摄影记者也跑到红军前线去，为避免查抄，他把软片围绕在腰部，逃出了西安。因看这几次偷渡成功的结果，南京政府发了一个军令给顾祝同的西安司令部，并且附有八个记者的名单，叫警察注意他们的行踪。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域，’也由军令严禁新闻记者入内。我如果跑到城外去，就随时可能被捕，并且被逐出西安的。反共战争是停止了，军事封锁是撤销了，但是新闻封锁却没有。

我似乎在进行着冒险家的一种最无希望的‘盲进主义，’

因为我发觉自己在西安没有‘群众的基础。’我不知道到哪里找寻一个同谋者。当斯诺旅行的时候，东北军曾是他的帮手，并且保护他通过他们的防线。现在，这个军队已是沿着铁路开到安徽去。‘五十五天’事变期中控制西安的叛乱精神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安分守法的公民。全城是经历着一个西安事变反动的时期。五个月以前，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少帅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不仅扣留蒋委员长，并且扣留了西安所有的军政领袖和蓝衣社员，现在，所有这批南京的人们已赶回他们的职位，而以一种报复的情绪，完全控制着这个城市。少帅已成了南京的阶下囚，杨虎城也就要到欧洲去了。少帅部下所有的东北人都离开了西安，杨的属员也在躲避着，惟恐他一离开，他们将遭受‘五十五天’的报复。

南京军事当局的性格是很难捉摸的，没有人敢冒险违反军令，把我私运出西安而送进‘禁城’去。我甚至没有一个通消息的人。我是跟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和一个学生代表同到西安的，那个记者愿意在游历苏区时充我的译员，而那学生则是去参加五月中在延安举行的会议的。现在，这两人没有一个敢来接近我，他们也并不一定要通过去。我在西安唯一别的朋友，就是那位当场自造假名的学生了。

而且，对于我现在企图更不利的，就是红军本身也变成最守法，最可信用一切了。他们正跟蒋委员长进行着恳切的谈话，他们已不是任何一种阴谋的党了。他们不赞成南京禁止外国访问者游历苏区的命令，但他们却也并不准备反抗。我把他们西安办事处的地址记在手提袋的金扣上，一到之后，就立刻通知他们。在我到西安的第一夜，一个红军人员到中国住宅里来看我，热情地欢迎我，并且替我安排明天早晨乘军用卡车出发——可惜天落了雨。他不久后就我知道我所遭遇的情形和南京命令的麻烦。他非常切望地从道德上帮助我，在我‘逃入苏区’

之后，他写了一封祝贺的信给我。但我直到五个月之后，才再看到他。

同时，红军也不愿跟警察发生丝毫的磨擦，因为他们的代表正来参加五月中的会议。一个中国人跑到绥远去然后再从那里到延安，原是并不难的，可是警察却把任何到达的人，凡是有共产党嫌疑的都拍起照来，并且尽量侦取关于他们的消息，以备将来之用。

我也许可以求西安本地人的帮助，可是我又一个不认识他们。教士吗？是的，中国多的是教士。但我要从他们得到鼓励是很少希望的。他们也许可以帮助我脱出困难，但却不能帮助我进入困难。这当我在我的卫队陪伴之下作了几次社会的访问后，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们的接待是千篇一律的。还没有听到我的要求，他们就首先提醒我，在王队长全夜侦寻我的一夜，他们的屋子曾被到处搜查过。他们于是又说那些想到苏区去的新闻记者的侵入，几乎摧毁了教会事业。有几个青年自愿到这些危险区域去工作，但当他们到来之后，警察惟恐他们里面混杂着一二新闻记者，又立即把他们赶上火车去。在西北从事‘合法事业’的人们，正为了旅行者愚蠢的好奇心受着苦。教士们是不大能够跑出城门的。他们归罪‘新闻事业’不像布道工作一样是一种‘合法的事业’，而我却正被自己不合法的地位厌得不能再替凡俗的新闻事业来辩护，因此，也就马上让全部事情按下不谈了。

其实，他们真正的困难只是开始于我个人脱逃成功之后。我不晓得我一时的好奇心所造成的苦难的程度，直到七个月以后我在北平看到了可畏的L先生才明白。我说这位可畏的L先生看见我，第一句话就爆发了久郁的愤怒，认为我害他这位‘合法的旅行者’受了不方便。他似乎曾经驾着汽车在‘中国僻野的西部’驶行五千里，而毫无大问题，可是他在我逃逸后

不久到西安，却就发生了困难。L先生是一位高贵的老练的中国通，他对于逃跑到任何红区里的举动的不感到兴趣，正同叫我驾了汽车旅行五千里一样，这是任何人除了王队长外一眼就会明白的，自然在他第一次谈论之后，更不必说。但是当时——一切告诉着L先生，帝国的高贵的萨克逊语在中国已不复是一种到处通行的暗语了——甚至皇帝陛下最合法的旅行者和商人。

迎宾馆曾是我以前非法旅行同伴们进行活动的中立地带。但当我抵达时，它却是确定地一个敌视的区域。

可怜的周，这沙漠中给西北旅行者休憩的一块沃壤的经理，他备着摩登的家具，外国的食物以及适当的卫生装置，是一个他自己权力中的英雄。他像一个寂寞的罗马哨兵，驻守着最远的文化岗位。在叛变的五十五天以及它的余波中，他始终同他的旅馆留守着。他是从上海来的一个新式商人，他曾化了几个月功夫，想在西安建立‘客人是对的’的新观念，但在一个封建的城市中，旅馆主人必须替他们的客人负责，而‘警察是永远不会错’的啊。他有着各种异样的旅客，合法的以及非法的。他的‘大饭店’在这时候建立起来，正好尽了叛变温床的作用。

七个月以前，一九三六年十月我逗留在那里的时候，他的旅馆不知怎的成了西北军政的实际中心。中国政治上的事情常是在茶馆中进行的，——但正当西安事变之前，西安的古老茶馆中有着这许多的耳目，因此那般政治阴谋者一齐都迁到迎宾馆，以在杂乱和众多中寻取安全。这时候，房间里拥满着中国每一支军队派来的官员，大家都忙碌地从事私下的讨论。空气中是充满着阴谋，正同大战时候圣彼得堡的尽人皆知的法庭一样。

说也奇怪，就在那只隔了一道薄薄泥墙的旅馆房间里的低声阴谋中，中国的军政大问题起了最后的冲突，结果爆发了所

谓西安事变。这里是蒋委员长部下骄矜的黄埔军官，穿着法兰绒的制服和皮马靴，佩着锃锃的指挥刀，跟他们的纳粹顾问商量着怎样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及中国要不要加入防共协定，他们又向军火商人要求着好处，并且跟一切亲蒋分子相联结。这里是从粤桂来的短小精悍的南方人，跟高大粗鲁的东北人讨论着反蒋的大阴谋。这里是杨虎城部下的农民出身的陕西地方军队，右耳倾听着这边，左耳却又倾听着另一边。这里讨论着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或民主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以及中国军队是否应该要求与苏联携手，还是答应日本同意广田三原则。这里，那违禁的问题也像低音调似的经过着讨论：军队是否应该允许他们的委员长开始一次新的剿共战争，还是逼他发动对日的抗战？——这个问题，马上由十五万军队的兵谏回答了。在阳台上休憩的都是中国各地军阀和各党派公开或秘密的代表，是他们的领袖派来跟秘密的政治形势通声气的。在迎宾馆里，也有一个红军派驻张学良司令部的代表来看我，劝我赶快回到北平去。

在十月的多灰尘的外面市街上，云集着各色各样制服的普通兵士。那怀乡的褴褛的东北人，跟那服装修整的中央军人吵着架，他们诚实的饱经忧患的面颊，给高贵的营养充足的南京兵士批击着。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本地兵士，也同样打着外省兵士的巴掌。剿共战争中的伤兵哀乞着救济，但都被他们的长官推到路旁去。在上层和下级队伍中，到处是叛变的空气。

言辞在军人中间是有燃烧性的，而这一切终于变成了行动，两个月以后，十二月十二日，中国海陆空军的总司令是被它的副司令劫持起来了。

这一天还没有破晓，周和他的同事在迎宾馆被一阵枪声和急促的枪柄敲门声惊醒过来，又被喝令站在一边，而他们的客人恐怕生命危险，都畏缩地藏到床下去。旅馆里住满着南京的

文武官吏，杨虎城部队的侵袭，就是想整批的拘捕。他们打伤了几个，并且枪杀了图逃的邵元冲。同时，他们又乘机搜拿周的旅客的个人物件和他的许多很好的羊毛毯。这时候，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迅速的赶到临潼去扣留蒋委员长。

在叛变的五十五天中，迎宾馆几乎是荒芜了，在二月里大家退出西安以后，可怜的周的旅馆，只是成为那些带有旅行禁城的困难计划的新闻记者们的过路之所了。现在，我在四月中第二遭来的时候，旅馆房间里充满着阴森的鬼气，正同外面街道一样的荒凉。这时候，没有一个重要官吏愿意留居在这里，因为杨虎城还有两团就要开发的部队扎在城中啊。



## 二 逃到苏区

我对于中世纪式城墙的效用，常觉有一种不能理解的印象。在中国，一旦当局要用的时候，他们只能把城门关起来，或通知哨兵。任何人没有通行证，就不许进城或出城。

然而在这次四月的几天中，我终于认识了城墙的充分价值了，我注视着包围西安的坚固的古代堡垒，我犹疑着不知怎样才能通过城门口的步哨。……

当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我决心排除一切的障碍——更不要说是城墙了，——虽然我没有想到这样一大串的阻力，即使我不算自己是在从事搜集史料的神圣的和完全‘合法’的事业，我也一定要奋斗的。我是不满于世界的一个，我永远忍不住被压迫的少数者的呼吁，因此，我内心的同情，完全战胜了我的意志。

不是主义，而是后面的一种‘破釜沉舟’的情绪，使我不仅决心去尝试，并且决心要成功。这是我到苏区去的最后机会了，我必须继续我第一次的尝试，否则我就永远不能再见西安城了，——更不要说延安。我如果不顾命令，我就将被军部拘捕，并将逐出省境。如果我要趁它还未改组之前去访问苏区和‘中国的红星，’我必须赶紧走。前一星期我曾看到从延安回来的李夫，他告诉我红军马上就要改组了。我又知道共产党大会决在五月中举行，那时候，所有红色领袖都将聚集到延安。我极想知道这些不可捉摸的领袖们的小传，我知道一等他们回到甘肃，宁夏以及其他远远的各处防线以后，我就将永远错过